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辑

余宏模
彝学研究文集

余宏模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辑

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

余宏模 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编者的话

中国的文化地理，可以作多种的解读：以秦岭为界，以北为北方旱地小麦文化，以南为南方稻作文化；以爱辉—腾冲划线，线之东为农耕文化，线之西为游牧文化；以地方特色名，又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吴越文化……大而划之，又可分为三种文化圈或称为文化版块：蒙藏的佛教文化圈、新疆的伊斯兰教文化圈，除此而外，所有版图均为儒家文化圈。于此编者所欲说明者，处儒家文化圈内的云贵、湘西、桂北，似乎更应该独立为“巫文化圈”。巫文化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上古之时，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立庙堂，而后独尊史官文化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一统天下之势，“巫”的处境每况愈下：被逐出庙堂、逐出中原，退而居于西南一隅，在土著中苟延。如此看来，西南土著中保有的巫风，恰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

昔以中原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依“五服制度”分野，贵州地处“要”、“荒”，位列边缘。但若以“巫文化”视之，贵州却正是“巫文化圈”之中心，所谓“西南之奥区”。在中原失落了的巫文化体系，恰好在贵州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梳理，可称上符“礼失而求诸野”的古训。

以人类学的眼光看贵州本土文化，大概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9世纪末，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传入中国，贵州就成为重要的对象研究地。从早期的传教士、西方学者，到中期的国内学者再到近期的本土学者，文化人类学在贵州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并形成了大批成果，成为了研究贵州省情和地域文化特征的重要视角。我社将对以往的贵州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作一爬梳，选编出六个专辑共60册一套的《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以“六十名著”诠释

“六百年贵州”。

作为分外之想，我们期望这套丛书成为研究贵州文化史和少数民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库，如同我们的先辈文通书局曾出版的《黔南丛书》一样，我们期以此套出版物能够推动地方文化史和贵州的“原生”精神文明的研究，甚至促成“贵州学”和“贵州学派”的诞生。

2014年，第2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贵阳召开，我社在已出版《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基础上，遴选出两辑15册，作为“书博会”的献礼。

本辑为“彝学辑”，共5册。



出版前言

彝族，就人口数量言，在贵州各兄弟民族中排在第五位，在以往历时千百年的封建社会中，彝族曾经是贵州这片土地的掌权者。在很长的时期内，贵州的政治建制、行政管治等，也都受到彝族的文化传统影响。

《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丛书》的第二辑是彝族专题。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选出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以期反映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对贵州彝族的人类学研究成就。

彝学研究，重镇在云贵川，发轫于马学良、杨成志等一批学者对四川大凉山地区彝族的考察研究。这批学者也因此成为了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家，因此可以说四川是彝学研究最早的重要阵地。

彝族的另一个世居之地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云南就推出了一套由刘尧汉教授编纂的《中国彝族彝学文集》，该文集内容丰赡，达50本之多。随同此文集出现的，是中国彝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热潮，一时研究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有关贵州彝学研究，其内容与重心，与上述两地有很大的不同，具体表现于：

第一，注重彝族语言文字研究。贵州对彝族同胞的文字和文献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学者丁文江先生在贵州首开彝族文献研究的先河。丁文江先生主编、罗文笔先生翻译的《爨文丛刻》就是中国彝族文字和文献研究的前驱。1949年以后，由丁先生开创的研究一直是贵州彝族研究的主线。贵州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收集整理和翻译了大量的彝族文献。彝族作为一个既有文字系统又有丰厚文献的古老民族，给民族学、人类学学界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也将贵州的彝学研究推到学术前沿。彝族的

文字史同汉文同样古老，彝族文献如《西南彝志》、《六祖源流》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最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之一。

其次，从人类学的眼光来研究彝学的，先驱人物多是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率先从东京湾沿红河上溯，进入云南、广西、贵州一带活动。他们当中的保禄是学界公认的西方近代彝学研究的先驱。本辑就收录了他的作品，以及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高尔迪埃的笔记，合称《早期传教士彝族考察报告》。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坪井洋文博士在中国政府的允许和支持下，率队对贵州彝族地区进行了较为周详的人类学调查工作。他的报告代表了国际学界当时的彝学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东瀛人类学学界的彝学研究水平。我们也将他的报告收入本辑。

第三，贵州开省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土官子弟非常重视，充分考虑了对少数民族子女的特殊教育。要求后者远赴京师，读圣贤之书，而后量才录用，使得外出游学的贵州籍彝族人士大都视野开阔，熟悉儒典，又承续了优秀的彝学传统。民国建立以来，彝族当中精英辈出。同盟会最早的积极分子中，就有彝族的领袖人物安健先生。他既有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素养，又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识。他所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是彝族上层人士中较早具有统一中央集权国家意识的作品。与他同时代的余达父（若璩）先生从日本留洋归来，受日本明治以后文化的影响，建造了“大屯土司庄园”。这座蕴涵日本风格的土司庄园，目前仍保存完好，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余先生的彝学贡献是他的《且兰考》。我们将安、余二先生的彝学双璧合集载入。

第四，抗战期间，大量内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汉族学者陆续进入大西南，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如吴泽霖等）相应地开展了许多民族调查。50年代以来，中央人民政府也积极地在西南、西北等边疆地区开展了对兄弟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调查，旨在配合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制定、民族识别等工作。这些社会调查的重要成果，广泛地涉及到贵州彝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历史文化，以及宗教生活等方面。本辑集合了这些学者们撰写的重要研究文章，定名为《当代学者彝学研究文选》。

最后，彝族学者对本民族的研究当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些当代彝族学者中，余宏模先生当是代表性人物。本辑集合他的彝学研究重要文章，定名《余宏模彝学研究文集》；其他彝族学者中，王正贤、龙正清、王继超等



也成绩斐然，我们将他们的成果也汇集在这里。

当然，坦诚而言，这部人类学丛书规模毕竟有限，无法完全囊括近百年来的全部彝学研究优秀著作。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只是从人类学角度来梳理贵州彝学材料。这些材料分属于文献的与田野的，它们的撰写者生活跨度在百余年间，其文字风格必然带有深厚的时代印记、民族背景、教育背景与学术背景。因此，我们完全采取“文从主人”的态度，一般都原文照录，不敢妄加改动。有些作品的著作权人一时联系不上，但为嘉惠学林、泽益后人，我们仍然冒昧地先行采用。请原作者或著作权人尽快同本社联系，我们再次深致歉意和谢意。

出版者



序

彝族是中国西南的主要世居民族之一。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珍惜、保护、研究并传承下去。

以彝文文献典籍为例，就涉及彝族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大多数具有不菲的学术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彝文文献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党和政府以及民间有识之士纷纷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进行抢救、保护与整理。三十年来，彝文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与此同时，彝学研究也同样日益发展和深入，不仅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彰显出彝学研究的勃勃生机。在其中，贵州彝学界有大量优秀的彝族学者和彝学研究著作。此外，历史上与现当代的许多海外学者也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彝学研究著作。

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些优秀彝学研究进行整理、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贵州大学出版社将贵州彝学若干重要著作结集出版，是一项很可喜的文化工作。我希望出版社、学者以及有识之士将这类工作持续下去，为贵州文化的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原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主席、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史学会会长，彝族)

按：余宏模先生，1932年生，研究员，著名彝族民族学专家，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贵州民族研究》主编，贵州民族研究学会和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担任多种重要学术著作主编工作，如：《贵州彝学》刊物和文集主编，国家民委主持的《民族大辞典彝族卷》副主编，《贵州通史》副总编和《贵州通史·清史卷》主编，《彝族通史》副主编。长期以来，余宏模先生在彝学领域求索钻研，著有学术著作多种，本书是余宏模先生多年彝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的选集。



自序

这本《彝学研究文集》是我经历“文革”十年浩劫之后，从教学单位调到恢复建制的贵州民族研究所从事彝学研究的部分成果。

“文革”十年浩劫给贵州彝族地区带来的灾难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当我深入田野调查，开始从事民族研究的时候，涉及到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许多问题时，便深切感到自己作为民族知识分子一员的历史责任。我想起了四川古代历史学家常璩说自己修史心情时的话：“反侧惟之，心若焚灼；惧益遐弃，城隍靡闻。”自己也希望努力“资膺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尘灰之中”，力求拨开被颠倒的民族历史的迷雾，点燃被摧残的民族文化的篝火。

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经对彝族著名学者刘尧汉教授说过这样一段话：“我鼓励你还要进一步好好研究彝族文化，研究彝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对此，大家还不很清楚。中国文化作为各民族创造的一个结构，彝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西南说，不研究好彝族文化，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就不好讲清楚。”又说：“凉山是彝族最后的基地，彝族文化发展的地区则是贵州的水西，以及云南的楚雄、大理一带，靠近昆明的地区。贵州水西的奢香夫人，是一位政治家，她看得很远，重视交通，讲民族团结。不是奴隶制那样讲打冤家，这种水平的文化，我看是出不了奢香夫人的。”既说明彝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也指出彝族内部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性。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璀璨的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的广袤地域。除汉族外，彝族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人口众多，并有自己古老文字和传统文化的民族。

贵州彝族作为彝族整体中的一部分与其他地区的彝族有其共性，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等诸多因素，贵州的彝族又具有本身的一些特点。比如黔西北接近内地，故开发较早，至迟在东汉时该地的彝族已建立起地方政权，迄今蜀汉有济火者被封为罗甸王，此即明代贵州宣慰司安氏的先祖。又如唐宋时，封建王朝在黔西北推行羁縻州县制，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当地已进入封建领主制阶段，以首领的宗亲管理“则溪”（官庄）为基础的制度乃其显著特点。再如元朝时，土司制度在黔西北实施，明洪武中彝族女杰奢香夫人深明大义，维护统一，开辟通道，有力地促



进了水西地区的发展。清初，水西与乌撒地区相继“改土归流”，但作为土司制度残余的土目统治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贵州彝区涌现出一批仁人志士，率领当地群众积极投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并为此做出卓越贡献。

此外，贵州长期以来即是彝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彝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因此，这里亦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彝族传统的历史与文化。著名的彝文典籍《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人文论》等一大批文化遗产，便得以长期流行于黔西北民间，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彝族大方漆器与各种石雕等，工艺精湛，造型古雅，远近均享有声誉。与此同时，黔西北某些地区由于在历史进程中深受中原汉文化影响，彝汉文化的交融，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而且还造就了一批彝汉两学兼优的彝族学者和诗人，这些都是贵州彝区突出的社会现象。

彝族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内容渊博，有待继承发掘，弘扬光大。这本文集选编的文章，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实际出发，在贵州彝区努力综合运用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各种资料，结合田野调查求证，为彝学研究领域的探讨作出微薄的奉献。感谢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大学出版社的关怀和襄助，文集得以编辑出版问世。敬请广大方家批评指正。

余宏模

二〇一〇年八月



目录

- 自序 / 1
01. 彝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 / 1
02. 彝族在贵州高原的古代历史变迁 / 16
03. 汉代“西南夷”与夜郎“夷”试析 / 30
04. 夜郎竹王传说与彝族竹灵崇拜 / 43
05. 可乐套头葬俗与南夷原始信仰试析 / 54
06. 夜郎青铜立虎与崇虎信仰试析 / 65
07. 济火碑与济火碑史实探证 / 74
08. 蜀相南征与“七擒孟获”辨析 / 82
09. 关于东爨乌蛮诸部的族源问题 / 95
10. 阿札城垣遗址和彝族播勒大革 / 105
11. 播勒彝文谱牒与罗殿王族遗裔 / 116
12. 试论明初奢香夫人维护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绩
——纪念奢香夫人逝世六百周年 / 127
13. 明初贵州宣慰使奢香家世考释 / 135
14. 略论明代贵州建省与改土设流
——纪念贵州建省590周年 / 146
15. 明代贵州宣慰使“赐姓安氏”例证 / 156
16. 王守仁与贵州宣慰使安贵荣 / 160
17. 明代水西慕魁陈恩墓碑探证 / 168

18. 明代万历壬辰水西大渡河桥彝文碑 / 180
19. 永宁奢氏铁坟和水西慕族安氏墓考 / 191
20. 明代水西朵泥则溪及彝族那威士目遗址调查 / 202
21. 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 / 210
22.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 222
23. 威宁乌木屯安巡如墓碑残文探证 / 232
24. 清代水西彝族土目和彝文田契试析 / 240
25. 大方县彝族柯官坟调查记实 / 252
26. 孙中山与彝族辛亥革命志士余健光 / 259
27. 清末状元袁嘉谷与彝族诗人余若琮 / 271
28. 黔西北乌蒙山区的彝族 / 278
29. 黔西北乌蒙山区向天坟与彝族传统文化 / 293
30. 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 305
31. 古代彝族布慕刍议 / 313
32. 贵州彝族毕摩文化与彝文典籍类例 / 322
33. 《爨文丛刻》与《增订爨文丛刻》 / 334
34. 中国彝族铜鼓礼俗与《铜鼓王》 / 343
35. 彝族扯勒家族在黔境内历史文化调查 / 354
36. 彝族扯勒部大屯土司庄园建置考 / 370
37. 彝族十月历调查札记 / 379



01. 彝学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展望

彝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是西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云南有彝族三百三十五万，遍布全省各地，而以哀牢山区、红河流域和滇北小凉山区较为集中。解放以来，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宁蒗、峨山、路南、南涧、景东、漾濞等六个彝族自治县和寻甸、新平、元江、江城、巍山、景谷、普洱、禄劝等八个彝族与其他民族的联合自治县。四川有彝族一百六十万左右，主要分布在川西南的大、小凉山地区及川南的古蔺、叙永等县，现建立有凉山彝族自治州和峨边、马边两个彝族自治县。贵州有彝族六十万左右，主要分布在黔西北山区，现建有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有彝族近万人，主要分布在隆林族自治县和那坡县。

彝族又是一个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境外中南半岛各国，主要是缅甸、老挝、越南、泰国，还有十多万彝族。在缅甸有彝族十余万，分布在掸邦东部边区；在泰国有彝族近万人，居住在龙谷河和莫河之间地带。在老挝有彝族一万五千多人，住在乌涅亚和孟格涅边界地区。在越南有彝族四千多人，居住在北部靠近中国的孟康、保乐等边沿县。据彝文文献和民间传说，他们均是在我国唐朝中叶以后陆续迁徙过去的。

彝族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历史悠久，对伟大祖国的缔造有着重大贡献，彝族人民创造的光辉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广大彝区不仅有丰富的物产资源，而且在旧中国彝族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可以说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因此，加强和提高彝学研究水平，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和发展中华彝学而努力奋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彝学研究的传统

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优良的历史和学术传统，彝族又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关于彝族及其先民的记载，很早以前就出现在我国的汉文典籍上。最早记载彝族先民情况的，首推汉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汉初著名的学者司马相如曾奉使至邛都地区（今凉山一带），司马迁也曾“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史记·太史公自序》)。他们关于彝族先民的记述,保存在《史记》有关列传中。此后历代的正史、别史对西南彝族,包括贵州彝族的情况均有记载。历代的地方志中记载彝族情况的首推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与唐人樊绰的《云南志》(亦名《蛮书》)。这两本书详细记述了当时彝族及其有关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种情况,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是研究当时彝族问题的重要依据。元、明、清时期记述彝族的书籍更多,除地方志如元人李京《云南志略》,明、清时川、滇、黔、桂的多种省志和府、州、县志外,尚有杂史、杂著、杂录多种。其较著名有明代《土官底簿》、明人谭希恩《土夷考》、明人倪辂《南诏野史》、明人杨慎《滇载记》、清人毛奇龄《蛮司合志》、清人何东铭《邛崃野录》等。记载贵州彝族历史的有明人田汝成《炎徼纪闻》、明人郭子章《黔记》和《青螺文集》、明人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明人刘锡玄《黔族偶存》等。

但是,对彝族进行系统的研究则是近代的事。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倡导对我国的国土开发,其中涉及对我国西南彝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铁路建设计划。同时,帝国主义此时对中国的侵略有增无已,于是开发祖国西南和西北以抵制列强侵略的舆论在全国蓬勃兴起。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上有识之士与知识界逐渐把视线转移到了边疆和民族地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沿海相继沦陷,祖国西南和西北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西南和西北的民族问题、边疆问题自然成为国人的注意重心。祖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而彝族的人口又居少数民族的首位,加以在旧社会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问题突出,因此,对彝族的研究就在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

1911年我省彝族辛亥革命前驱安健前辈,就在《地学杂志》二卷十八期发表了《贵州土司现状》一文,1928年9月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四卷四四至四五期上发表《贵州民族概略》,向国人率先介绍了贵州的民族概况,包括彝族状况。1912年四川都督府派员赴小凉山彝区调查,并于当年出版《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表册》。1920年8月曲木藏尧等在《新亚细亚》二卷五期发表《罗罗民族之要求》,到1923年5月在《方志周刊》七卷四期又发表了《西南国防与保夷民族》。1933年云南省昆华教育馆编印《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同年,国民党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出版《西南夷族考察记》(曲木藏尧编)。1935年,旧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派员赴马边、雷波小凉山山区调查(有徐孝恢教授等参加)。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营,派出“边政设计委员会边区调查团”三十余人,由雷波往西昌,在大小凉山调查(有常隆庆教授等参加),此后于1939年出版《宁属调查报告汇编》。1937年,旧四川省建设厅编印《四川西南边区雷马屏峨昭五县垦牧调查报告》。1939年,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发表《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对西昌、昭觉、冕宁“夷务”提出“视察报告”(黄炎培先生根据当时视察彝区所见,写入所著《蜀南三种》,于1941年出版)。1941年,旧西康省政府



出版《西康夷族调查报告》（庄学本著）。同年，旧四川省政府出版《雷马屏峨夷鸟瞰》、旧四川省教育厅出版《雷马屏峨记略》，系该厅所派边区施教团考察四川小凉山山区所搜集的资料，有柯象峰教授等参加。1942年，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该委调查室所编《宁属洛苏调查报告》。1943年，正中书局出版《云南边民录》。1947年，旧四川省建设厅出版《大小凉山之彝族》。上述调查研究，主要是根据旧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教需要出发，由官方组织的，且限于当时条件，故调查不可能深入，而观点也不见得正确。但这些资料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彝区许多重要情况与线索，就其资料而言，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与此同时，不少学术团体与学者亦相继进入彝区进行调查研究，为我们留下一批很有学术价值的宝贵资料。彝族知名人士岭光电先生于1925年7月《新夷族》一卷一期发表了《西南彝族史》，此后又有《保情述论》一书于1942年问世。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组织学者考察大小凉山的民族、人文、地质、动物和植物，次年出版《雷马屏峨调查记》。1939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组成川康科学考察团，从西昌至雷波沿途进行考察，此行有马长寿教授等参加，考察团有报告问世。1941年，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调查考察凉山彝区，团员曾昭伦教授著《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于1943年出版。同年，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由林跃华教授率领考察彝区，林氏著有《凉山彝家》于1947年出版。此外，不少学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只身深入彝区考察，并写出专著，较著者有杨成志关于彝族的调查《中国西南民族中国罗罗族》（1934年），徐益棠《雷波小凉山之罗民》（1943年），任映苍《大小凉山佯族通考》与《大小凉山开发概论》（1947年），江应梁《凉山夷族的奴隶制》（1948年），马学良《云南佯族之神话》（1942年）等。

据不完全统计，自1911年至1949年，关于彝族研究和调查的专著有五十余种，论文有一百余篇。这些著述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彝族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情况、经济生活、政治组织、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见地。但总的说来，此中除少数问题研究得较为深入外，多数尚停留在介绍叙述或研究的初期阶段。同时，由于凉山彝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且所处的位置在川滇两省交通要冲，又加以当时处于奴隶制阶段，故凉山彝区的调查研究又成为整个彝族调查研究的重点。

二、新中国的彝学研究

新中国的成立为彝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也为彝学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党和政府在制定彝族地区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时，也需要彝学研究者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作为依据。



建国初期，为了贯彻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遇到的就是彝族的民族识别问题。众所周知，彝族居住的地域广阔，支系繁多，自称与他称均不相同，社会发展水平亦不很一致。如此众多的称谓，究竟是同一民族的支系？或是不同的若干民族？这在未经过民族识别的调查以前，是不完全清楚的。因此，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大批民族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参加下，主要在云南进行了这一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终于弄清了彝族这一整体的民族构成，据调查仅云南彝族的自称就有三十七种，他称有四十四种。此外，还有侮辱性称谓多种。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民族内部的协商，废除了侮辱性称谓，将同一民族的各支系统称为彝族，从而为各地彝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不仅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也是彝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存在的奴隶制度虽然早为中外人士所共知，但这种奴隶制究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否占居主导地位，以及它到底有何特点？这在解放以前是不甚清楚的，且在学术界对此的观点也不尽一致。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判明凉山彝族社会的性质就成为解放初期开展彝族工作所必需。为此，大批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从五十年代初期即已投入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多次调查与学术讨论，大多数意见已趋于一致，确认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属于奴隶社会，而这一奴隶社会又具备着它自身的若干特点，既不同于希腊、罗马古典的类型，也不属于古代东方的类型。1956年，党和政府根据大量的凉山社会调查资料，制定了特殊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民主改革的胜利，彻底废除了落后的奴隶制。1956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少数民族的诸种社会形态，在全国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迄至“文革”以前已对彝族的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形态，甚至原始社会的残余，都作了详细的调查。调查报告已铅印的计：四川方面22本，云南方面3本，贵州方面3本，广西方面1本。同时还继续进行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探讨，有关论文已汇编成《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倡议编写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已于1982年出版。同时还有胡庆钧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一书于1985年出版，周自强的《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亦同时出版，体现了此项调查研究的成果，成为对凉山彝族研究“科学大厦的奠基石”，对丰富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作出了一定贡献。

彝族历史悠久，历史上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诸如族源问题、各支系的迁徙与发展问题、阶级社会的起源问题、社会发展史的分期问题、元代设置的流官与土官的关系问题、明清彝族社会的演变问题等等。建国以来，许多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文。目前对有的问题已有一致的看法，但大多数问题意见还相当歧异，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彝族的史料还有许多薄弱环节，汉文资料着重于政治、军事方面，而又系统的整理汇编不够；彝文资料翻译出版不多，且过于简略，注释考证以及在时间与空间概念上不甚详细所致。目前彝族史已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方国瑜《彝族史稿》、马长寿《彝族古代史》、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刘尧汉《彝族社会历史调